

伐 佐 夫

轭 下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伐 佐 夫

轡 下

施 蛰 存 译

石 斌 陈 珍 校订补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二 年 · 北 京

ИВАН ВАЗОВ
ПОД ИГОТО

根据英文译本《UNDER THE YOKE》(WILLIAM HEINEMAN. LONDON, 1912)转译。

根据保文本 «ИВАН ВАЗОВ СЪБРАНИ
СЪЧИНЕНИЯ» В XX ТОМА 中第十二卷
(БЪЛГАРСКИ ЛИСАТЕЛ 出版社,
СОФИЯ, 1956)校订、补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
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
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
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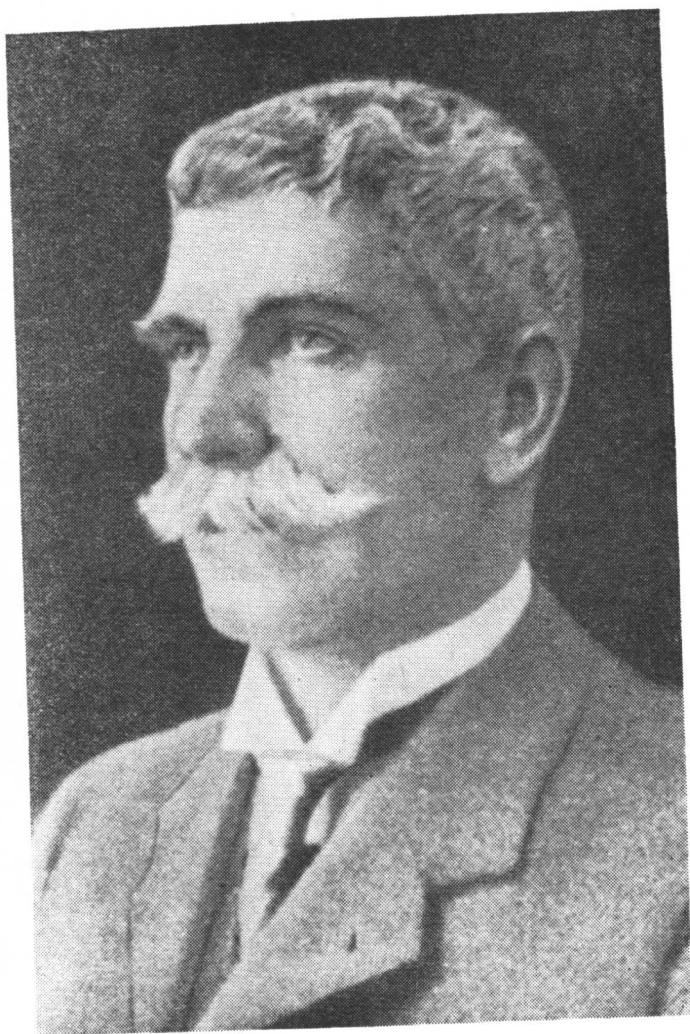
字数389,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9 $\frac{1}{16}$ 插页3

1982年4月北京第1版 198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47,000

书号 10019·3292

定价 1.80 元



作者像

2AP 87/03

译 本 序

《轭下》是保加利亚著名作家伊凡·伐佐夫(1850—1921)写的一部不朽的长篇小说。它问世九十年来，一直以深刻的爱国主义内容、真实的生活画面和动人的形象吸引着广大读者，有着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中欧、东南欧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所产生的许多文学杰作中，《轭下》也是很有代表性的。

—

鲁迅先生为了介绍东欧被压迫民族立意在反抗的呐喊文学，一九二一年翻译过伐佐夫的短篇小说《战争中的威尔珂》，一九三五年又译过他的《村妇》(今译《一个保加利亚妇人》)，并称赞他“不但是革命的文人，也是旧文学的轨道破坏者，也是体裁家”。^①这不是偶然的。伐佐夫一生写了许多作品，包括诗歌、小说、剧本、游记等。这些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近半个世纪中保加利亚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有力地推动了保加利亚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① 《鲁迅全集》第11卷，第368页，并见《鲁迅译文集》第1卷，第411页。

同时，使长期处于异族统治下不为人们所注意的保加利亚文学“在各文明民族之林中迅速地占有它应得的地位”（高尔基语）。

伊凡·伐佐夫于一八五〇年六月二十七日诞生在巴尔干山南麓的索波特城，从小在本地学校读书。他十五岁时去卡洛费尔和普罗夫迪夫中学求学，除熟读为数不多的保加利亚文学作品和译作外，还从俄文和法文书籍中吸取精神食粮。从此爱好文学，习作诗歌。早期的诗作大都描写爱情，深受当时流行的感伤主义的影响。大部分手稿毁于火灾，未曾发表；少数得以保存，后来收在诗集《五月的花束》中。

伐佐夫的文学爱好得到母亲的赞赏和支持，但遭到父亲的冷落和反对。他的父亲是商人，一心想让儿子继承己业，于是迫使他中途辍学，竭力培养他对商业的兴趣，一八七〇年又把他送到在罗马尼亚经商的一个伯父那里当学徒。当时，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许多爱国志士和革命领导者侨居罗马尼亚，积极准备起义。伐佐夫往来于他们之中，受到他们的思想感情的熏陶。结识革命诗人和民族独立运动领袖赫里斯托·波特夫，对他尤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时，他在革命刊物上发表了《松树》等爱国诗篇，博得了声誉。从此伐佐夫的诗歌便摆脱了感伤主义的羁绊。

一八七二年，伐佐夫回国。他先在斯维列格勒任教，努力向学生们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因而引起当局不满，被迫离职去索波特，加入了由著名活动家卡勃列什科夫领导的秘密革命委员会，从事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并写了许多战斗诗篇。家喻户晓的诗《帕纳丘里什特的起义者》成为四月起义的战歌。

起义失败后，伐佐夫被迫流亡罗马尼亚。在那里，他担任保加利亚侨民进步组织“慈善协会”秘书长，为团结分散的爱国力量而积极活动；同时又以文艺为武器，号召人民进行新的斗争。他在布加勒斯特出版了《旗与琴》和《保加利亚的悲哀》两部诗集。前者是四月起义的颂歌，表达了人民“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后者则是对异族统治者残酷镇压起义的愤怒控诉，反映了人民的苦难与悲痛。随后，伐佐夫又出版了诗集《拯救》，除了继续描写前两部诗集中已经表现过的主题外，主要反映保加利亚人民迎接独立时的喜悦心情。这三部诗集组成了以四月起义为题材的诗歌三部曲。这些诗继承了波特夫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充满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为保加利亚诗歌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一八七八年保加利亚独立后，伐佐夫回到祖国，起初担任贝尔科维察地方法院院长，后去普罗夫迪夫，从事社会和文学活动。他组织名为“科学”的文学团体，出版同名刊物。该刊停办后，又主编《曙光》文学杂志和《人民之声》报，将文学界进步力量团结在这些刊物的周围。这一时期，他的作品扩大了题材范围，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达到新的高度，相继出版了揭露资产阶级政治上勾心斗角、爱钱如命的诗集《琴》、《田野和森林》；描写旅行意大利观感的诗集《意大利》；表现小市民生活的幽默中篇小说《叔叔伯伯们》；反映爱国侨民生活、歌颂民族解放斗争的中篇小说《流亡者》和塑造出一系列英雄形象、标志着伐佐夫爱国主义诗歌高峰的组诗《被遗忘者的史诗》等。

九十年代，伐佐夫当选为议员，担任过教育部长。他看

到，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① 严酷的现实打开了伐佐夫的眼界，他在作品中由八十年代对现实生活的间接抨击转为直接揭露与批判。他先后写出了《中短篇小说集》（三卷），短篇小说集《痕与斑》、《花花世界》、《见闻录》，讽刺喜剧《升官图》等，这些作品都具有尖锐的政治倾向和艺术概括力。作者一方面对官僚政府的贪污腐败，警察的恐怖统治，资产阶级的道德堕落等丑恶现象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同时，他还广泛地描写了农民、职员这些小人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悲惨遭遇，对劳动人民寄予无限的同情。在此期间，伐佐夫还著有长篇小说《新的土地》和《卡扎拉尔的女皇》。前者以主人公纳伊登·斯特雷姆斯基的生活经历为线索，广泛表现了从一八七八年独立至一八八五年南北保加利亚合并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生活；后者以二十世纪初的社会生活为背景，描写一个乡村女教师的悲惨遭遇。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对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空虚和伪善，对资产阶级家庭的变态关系进行了剖析，然而作者把道德完善作为理想加以歌颂，幻想以阶级调和或通过文化教育去填补相互对立的阶级之间的鸿沟，从而削弱了作品的思想价值。

巴尔干战争爆发前，伐佐夫处于思想矛盾之中。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使他感到失望，可是他又看不到新的社会力量，找不到出路。因此，他便把目光转向保加利亚的中世纪历史，写了小说《斯维托斯拉夫·特尔特尔》、《伊凡·亚历山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3页。

剧本《走向深渊》、《鲍里斯拉夫》和《伊瓦伊洛》等。这些作品具有爱国主义内容，但其中有一部分美化了资产阶级统治集团。

一九二〇年，保加利亚人民为伐佐夫的七十寿辰及从事创作五十周年而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翌年九月二十二日，他在写作剧本《宝座》时，因心脏病突发而与世长辞。

二

伊凡·伐佐夫谈到构思《轭下》的过程时说：“我的目的在于描写保加利亚人受奴役的最后年代的生活和四月起义时代的革命精神。”^① 我们知道，象许多巴尔干国家一样，保加利亚从一三九六年至一八七八年遭受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奴役，将近五百年之久。长期的异族统治，使保加利亚的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民族文化受到摧残，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另一方面，保加利亚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最初，这种斗争处于分散状态。许多人被逼得无路可走时，便逃进深山，伺机报复土耳其统治者，这就是民间史诗中所歌颂的“海杜特运动”。

十八世纪中期，奥斯曼封建帝国开始解体，资本主义关系逐渐发展。“资本主义闯进了被排挤的民族的平静生活中，惊醒了它们，使它们动作起来。”^② 以帕伊西·希伦达斯基所著《斯拉夫保加利亚史》为标志，保加利亚开始了民族复兴。

① 《伐佐夫全集》第19卷，第161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301页。

许多爱国志士为教会独立和政治独立而斗争，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十九世纪中期，保加利亚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在瓦·列夫斯基、留·卡拉维洛夫、赫·波特夫等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央革命委员会，秘密革命组织遍布全国，积极准备推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一八七六年四月，保加利亚爆发了席卷全国的武装起义，虽然遭到残酷镇压，但它动摇了土耳其统治的基础，在保加利亚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轭下》就是一部以四月起义为题材的史诗般的作品。

如同亚当·密茨凯维奇的著名长诗《塔杜施先生》一样，《轭下》成书于作者流亡国外时期。

一八七八年，保加利亚获得独立。从此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而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和弊病也日益暴露。篡夺了革命胜利果实的资产阶级，热中于争权夺利，聚敛财富，背叛了民族复兴的理想。新的社会现实使伐佐夫感到失望和悲愤，他力求在自己的作品中再现被权贵们忘却的民族英雄们的形象。

一八八七年，由于国内政局的变动，伐佐夫被迫流亡俄国敖德萨。在那里，他“感到失去祖国的悲哀和痛苦”^①，他的心“每时每刻都向祖国飞去”^②，“四月起义期间祖国蓬勃生活的画面”^③占据了他的脑海。于是，他天天写小说，以减轻精神上的痛苦和寄托对祖国的思念。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写小说时，我心灵中激起的许多美好回忆，使我跟失去的祖国

①、②、③ 《轭下》第五版原序。

经常保持着联系，在流亡生活的辛酸滋味中，写小说成为我唯一的安慰了。”^①他又写道：“我忘却了放逐的痛苦，沐浴在珍贵的和永志不忘的回忆的浪潮之中，感觉到幸福愉快。这些回忆给了我灵感，给了我的文思以新的翱翔和新的青春。”^②伐佐夫就是在这种环境和心情中完成《轭下》前半部的。起初，他为自己的小说酝酿了近十个书名，如《血染朝霞》等。有一天，他将书名写在纸上，请朋友们选择，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选中了《轭下》。于是，作者就以此为本书的名称了。

一八八九年春，伐佐夫回到保加利亚。他继续写完了《轭下》后半部。一八八九至一八九〇年，这部作品连载于伊凡·希什曼诺夫教授创办的《民间文学、科学和文学丛刊》头三期上。

三

《轭下》是一曲民族解放斗争的颂歌。它以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背景，真实地表现了土耳其统治末期保加利亚人民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人民的觉醒，四月起义的准备和爆发，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作者通过一系列矛盾和冲突，绘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小说开头，从马尔科家平静的生活中，就可看出新的思想已经渗透到这个家庭里，他们憎恨地谈论土耳其人的暴行，盼望获得自由。革命者克拉利奇的到来，打破了白拉切尔克瓦

① 《伐佐夫全集》第19卷，第179页。

② 《轭下》第五版原序。

城平静的局面。他在磨坊里杀死了两个行凶作恶的土耳其人后对磨坊主人说：“我没干多少事啊，老爹！我们只杀掉了两个，但是还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妖魔呢。如果我们保加利亚人大家都拿起斧头来劈倒这些敌人，那么保加利亚才能得到自由而生活在和平里。”这段话点明了克拉利奇来到该城的使命。它告诉我们：保加利亚人民不会再任人宰割，他们将复仇、反抗。接着，从索科洛夫被捕所引起的不同反应和女子小学考试时克拉利奇化名奥格涅诺夫公开与土耳其的走卒斯特弗乔夫发生冲突等描写中，我们看到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逐步展开。在《演戏》一章中，作者对保加利亚人民心中蕴藏已久的爱国热情作了生动的描绘。本来是演《根诺薇娃哀史》，但演出结束时，全场当着土耳其知事的面，突然唱起了“对祖国的热爱，火焰一样地燃烧吧，我们要与土耳其人堂堂对阵”这首革命歌曲，“一种突如其来的爱国热情充满了全场人们的心。这支歌的雄壮的调子象一阵看不见的波浪，奔腾涌起，充满了剧场，越过门槛倾泻而出，淹没了庭院，一直飘扬到外面夜色里……这歌声划破了夜空，点燃起人们的心灵，使人们兴奋得如痴如狂。它那有力的音节在观众心里唤起了一种新的情感。”从这段热情洋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保加利亚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无论在《扼下》还是在其他作品中，伐佐夫从不以旁观者的身份纯客观地描写事件和人物，而总是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将自己的思想感情融贯其中，作者的心随着时代的脉搏而跳动。

伐佐夫力图通过日常生活的描绘，再现人民的革命热情。因此，作者以敏锐的眼光和透彻的洞察力，深入到生活的各种

场景之中，从社会到家庭，从城市到农村，总之，从现实生活的各个角度发掘和表现时代的革命精神。如甘科咖啡店简直象个小小的议会，人们常常聚集在这里谈论政治，进行争论，打听外界传来的新消息，公开谴责土耳其人的暴行，赞扬其他斯拉夫民族的英勇斗争。连日常的娱乐活动也改变了内容和性质，乡村晚间集会和缝纫会上，响彻着嘹亮的革命歌声，连小学生们也象士兵一样步伐整齐地操练着。作者通过许多生活细节的描绘，生动地表现了人民的新的精神面貌。我们看到革命热情已在青年们、知识界、小市民阶层和农民的心间沸腾起来，到处都在谈论和准备武装起义。在《一个民族的疯狂》一章中，作者有力地概括了起义准备工作进入高潮时的真实情景：全国象一座巨大的火山。川流不息的宣传员跋涉于山野里，组织斗争。人民如饥似渴地倾听他们关于自由的演说。为了响应“准备好，我们必须不怕牺牲”的号召，教会献出了神父，学校献出了教师，田地献出了农夫，母亲献出了儿子。各地革命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昼夜不停地派遣信使。农民赶着造枪弹，年轻人整天练枪法，妇女们缝袜子、烤饼干，皮鞋匠做背包、子弹带和军鞋。每一个村里，武器、子弹和火药的储藏一天天地增多。这是有各阶层参加的人民起义的生动写照。伐佐夫曾参加四月起义的准备工作，亲身感受到了时代的革命气息。因此，在他的笔下，人民的高涨的爱国热情和时代的面貌被描述得如此生动逼真，感人至深。

读者自然想从这部作品中了解四月起义本身的情况。遗憾的是，小说中描写起义的篇章却显得苍白无力，只是象大事记似的叙述了起义头五天的情景，见不到表现群众性的英雄

主义的场面,这显然与作者亲身体验不足有关。伐佐夫在《一个民族的疯狂》一章中告诉我们,他注意的只是“这一次斗争的序曲”,即起义的准备过程,因为“保加利亚的民族精神从来没有发扬到这样的高度”。他认为这一场斗争本身是“最乐观的希望之完全失败”,不值得作为范例,所以不打算描写它。不过,在小说的结尾,作者以动人的笔调描写了奥格涅诺夫、索科洛夫等人的英勇战斗和壮烈牺牲的情景。虽然他们为数不多,但毕竟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从他们的英雄行为中可以窥见保加利亚人民崇高的革命精神之一斑。

伐佐夫在《轭下》中生动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他们都置身于起义运动这个矛盾焦点上,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阶级特性、生活习惯活动着,斗争着,变化着,都具有鲜明的个性。作者告诉我们:“其中大部分人物都是索波特的真实人物,不过用别的名词来叙述罢了。”^①

奥格涅诺夫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他由于参加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游击队,被判无期徒刑,经历八年的监狱生活后逃出虎口,来到白拉切尔克瓦城,改名换姓,以教师职业为掩护,继续革命,很快就成为各阶层人民注意的中心人物。他从到达该城之日起,直至最后壮烈牺牲,始终处于斗争的漩涡和生活的激流之中,经历过无数次出生入死的考验。虽然伐佐夫没有用很多笔墨直接描写他的革命活动,但从他出现后白拉切尔克瓦城的思想气氛和人们的精神面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中,从各阶层人们的谈论和对待他的态度中,从他自身的言谈

① 《伐佐夫全集》第19卷,第161页。

中，读者处处感觉到他是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热爱祖国，忠于人民，将自己的一切都服从于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这一崇高目的。作者通过阿尔蒂诺沃、维利果沃等地的农民对奥格涅诺夫的无比尊敬和热爱，突出了他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他的深厚的群众基础。他是革命领导者，同时又具有普通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为了拯救因他而被捕的索科洛夫，他决心作出自我牺牲。对钟情于他的女教师拉达，他真诚而坦率地说出了自己以往的经历及面临的危险处境；起义失败后，又不顾一切危险去救她。这样一个具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勇于自我牺牲的人物，自然会受到一切革命者和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热爱。就是那些与革命毫不相干的人也对他怀着几分敬意和同情。连追捕他的土耳其人，也把他当作神话中的勇士来传颂。作者通过奥格涅诺夫的革命活动，真实地反映了一八七六年四月起义的历史面貌，给人以很大的鼓舞。应当指出的是，在《到锡利斯特拉之路》一章中，作者在写奥格涅诺夫同大学生坎多夫辩论时，把前者写成这样一个人物，他是领导者，但他否定和反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认为它不是人民的理想，在保加利亚没有基础。这种描写违反了历史的真实，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局限性。伐佐夫出身于商人家庭，就其经济地位来说，属于中产阶级。保加利亚独立后，这个阶级在政治上不断发迹，经济地位日益上升，逐步走向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他们是否定和反对当时初露头角的社会主义运动的。

另外两个革命者索科洛夫和坎多夫的形象不及奥格涅诺夫那样生动，但都具有自己的个性特征。索科洛夫年轻活泼，

热情奔放。他有自己的爱好，热心参加各种社交和娱乐活动。坎多夫脱离实际，死啃教条，思想偏激。由于作者不理解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所以在他笔下只能出现这种苍白无力的歪曲了的社会主义者的形象。

如果问这部作品中哪个人物形象最丰满，回答既不是奥格涅诺夫，也不是索科洛夫和坎多夫，而是马尔科。这个人物的原型是作者的父亲，自然是他最熟悉的。因此，他对马尔科特别偏爱，写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马尔科是个富商，受到各方面的器重，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他十分小心地避免与官场发生关系。这样一个人，当然是不会轻易去冒斗争风险的。在事变的激流中，他一直矛盾重重。而客观事件又推动他前进，使他的思想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之中。起初，虽然他具有爱国思想，热爱和尊重奥格涅诺夫，并机智地偷换了警察送往衙门的革命传单，使被捕的索科洛夫得救，但是，他不赞成起义，不相信革命会胜利；后来在革命运动的影响下，他开始支持起义，献出樱桃树做大炮，但他赞成的只是准备工作，而不是起义本身。“谁知道呢？”这个问题老是纠缠着他，因此，他不让自己的儿子们参加革命活动；最后，当他看到全国的革命形势如火如荼，连他自己的家也变成了一所完备的军火库时，他才相信革命会成功，生平第一次为保加利亚祈祷。作者详细描绘了马尔科由疑虑、动摇到坚定的思想转变过程，细致地刻画出了在政治上要求获得自由，但又十分软弱的那一部分资产者在四月起义年代的矛盾的心理状态，使他成为一部分资产者中的典型代表。

伐佐夫在《轭下》中还塑造了许多农民形象，其中以杀熊

者伊凡最为读者所喜爱。作者是以起义为背景来描写他的。尽管着墨不多，但他的形象却象浮雕似的突现纸上。他外表象座山，魁梧奇伟，膂力过人，一个人就把一门由樱桃树干做的大炮背上了山峰；他在斗争中积极主动，态度坚决，即便新婚之夜，他也毫不迟疑地参加战斗；他对待同志真诚友爱，在起义失败后的艰苦日子里，宁可自己吃血淋淋的生兔肉，也不肯接受奥格涅诺夫的面包；当许多人灰心失望时，他认为保加利亚没有完，仍然信心十足地到罗马尼亚过流亡生活，准备未来的战斗。作者以浪漫的笔调，通过这个色彩鲜明的形象概括了作为四月起义的基本力量的农民群众的特点。

小说真实地表现了当时保加利亚社会的阶级分化。一方面是包括手工业者、小市民、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内的人民群众，他们团结在奥格涅诺夫等革命者周围，是起义的主力军；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中依附于土耳其统治者、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这一部分反动的资产者，其代表人物有尤尔丹·狄阿曼迪耶夫、基里亚克·斯特弗乔夫等。作者有力地揭露了他们阴险、残暴的阶级本性。

《轭下》在艺术上也颇具特色。伐佐夫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全面地展示了一幅反映保加利亚人民在四月起义年代的生活和斗争的画面。它具有这样的魅力：一开头就把你紧紧抓住，使你的思想情绪不知不觉地随着情节的发展而起伏，不能平静，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故事的发展和主人公的命运如何。小说第一章，随着不速之客克拉利奇的出现，马尔科家的局面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墙上几片瓦噼噼啪啪砸下来，鸡群乱飞乱扑，女仆惊叫有贼，妇人和孩子们躲进屋里，马尔科抓起